

柔性税收征管提高了企业韧性吗？

——基于纳税信用评级的准自然实验

徐荣^{1,2} 李学峰³

(1.浙大城市学院 城市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5;2.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3.南开大学 金融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提升企业韧性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尤为重要。基于2008—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揭示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柔性税收征管显著提升了企业韧性。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获得A级纳税信用评级企业的韧性显著增强。其双重作用机制体现为,一是增强企业的供应链声誉,从而提升供应链稳定性,降低供应链集中度。二是在内部治理层面,有效降低高管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呈现非对称性,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生命周期方面,对于民营、小规模 and 成长期企业韧性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在信息环境维度,声誉补偿效应使得政策对分析师关注较低企业的韧性提升更显著。“金税三期”工程与柔性税收征管形成“刚柔并济”的政策协同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强化柔性税收征管的韧性提升效果。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企业韧性研究的理论边界,揭示了柔性制度在组织韧性构建中的独特价值,也为优化税收治理体系、实现“放管服”改革效能转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柔性税收征管;企业韧性;供应链声誉;超额薪酬;超额在职消费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5)05-0055-15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与极端风险事件交织的背景下,企业韧性作为应对外部冲击的核心要素,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企业韧性作为组织抵御危机、适应变革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能力^[1],其形成机制不仅取决于内部资源禀赋,更与外部制度环境密切相关。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数字化技术创新^{[2][3][4]}、内部资本市场^[5]与战略联盟^[6]等企业内生性因素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却较少关注税收治理模式转型对企业风险应对能力的结构性影响。尽管已有文献揭示了税率调整^[7]和税收征管独立性等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8],但以纳税信用评级为代表的“柔性”征管机制如何通过重塑政企互动关系赋能企业韧性,仍缺乏相关理论研究,这一研究缺口在制度环境动态演化的中

收稿日期:2025-04-02

作者简介:徐荣(1993—),女,湖南祁阳人,浙大城市学院城市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李学峰(1965—),男,天津人,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情境下尤为凸显。国家税务总局于2014年发布了《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通过建立企业纳税信用评价体系,依据纳税人履行义务情况实施信用分级管理,并定期公示A级纳税人名单。这一制度创新是我国柔性税收征管机制的制度化开端。相较于传统强制性征管模式,该体系运用分类监管措施将纳税信用转化为声誉资产,其构建的激励相容机制能够多维度优化企业韧性发展路径,但其相关因果机制与制度边界尚未被系统解析。在此契机下,探讨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效果及内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企业自身微观情境和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对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持续培育企业韧性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税收征管模式从“强制型”向“柔性化”转型的趋势引发学界广泛讨论。孙雪娇等(2019)研究指出,柔性税收征管通过优化征纳互动向市场传递企业合规经营的信号,从而降低企业与外部资金供给方的信息摩擦和监督成本,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9]。这一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起点,使得融资约束的缓解成为柔性征管影响企业行为的关键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向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拓展。柔性税收征管通过融资约束渠道改善企业资源配置能力的结论得以验证。一方面,纳税信用评级较高的企业因外部融资成本的降低,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向创新领域,从而增加研发投入并提升创新效率^[10]。另一方面,信用融资能力的增强也为企业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优化投资决策的合理性,从而推动投资效率的提升^[11]。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开始关注柔性税收征管对投资结构的引导效应。闫慧慧(2023)的研究认为,柔性税收征管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增加实体投资,抑制脱实向虚的投机行为,推动企业投资结构向实体经济倾斜^[12]。在转型发展与社会责任领域,柔性税收征管的影响具有更广泛的外溢性。刘元生等(2025)探讨了增值税税率的简并优化的财政经济效应^[13]。针对企业ESG表现,学者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认为,柔性税收征管通过改善融资条件,为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与治理(ESG)提供了外部支持,进而提升了ESG表现^[14]。微观分配领域的研究则表明,柔性税收征管通过调整企业雇佣决策,优化企业劳动力结构,进而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15]。

学者已多角度探讨了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上述成果为理解柔性税收征管的经济后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然而,已有文献大多立足于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摩擦缓解的作用机制,并未考察客户与供应商视角的外部供应链层面的信号传导机制。进一步地,现有文献尚未形成企业内部治理与外部供应链的内外双重机制的分析。并且,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鲜有学者研究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的影响。那么,柔性税收征管能否提升企业韧性?是否存在内外双重作用机制?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通过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的准自然实验,系统检验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以下问题。一是柔性税收征管是否能够成为培育企业韧性的制度工具?即纳税信用评级制度能否提升企业韧性?二是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影响企业韧性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三是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所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等相关问题。

相较已有研究,本文的增量贡献主要体现于在以下三个方面。(1)现有研究主要倾向于关注企业内生因素,而较少分析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韧性的结构性影响。本文研究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的影响,能够为税收治理体系改革的政策效果提供证明。(2)在理论机制层面,本文立足于剖析企业内部治理与外部供应链的内外双重机制,揭示了柔性税收征管对于降低高管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的政策效果,同时揭示了柔性税收征管对供应链稳定性和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3)为探讨政策效果的异质性,本文不仅考虑了企业层面的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生命周期阶段以及信息环境维度的分析师关注的异质性,还针对数字征管层面的“金税三期”工程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探讨,使得异质性分析兼具企业自身层面和制度环境层面的因素。进一步,本文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性影响。这为优化税收治理体系改革,实现制度与治理协调,发挥内外共治优势,持续提升企业韧性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柔性税收征管提升企业韧性

企业韧性是指其在面临外部挑战、竞争压力和商业困境时的恢复与适应的能力^[16]。这种能力不仅涉及企业内部的资源、能力与机制,还需要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与适应^{[17][18]}。企业韧性主要考察的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的问题,因此被视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取得商业地位的关键要素之一^[19]。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通过企业韧性的培育与建设以提升整体经济发展韧性至关重要。作为一种柔性化的税收征管方式,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提升企业韧性的关键在于资源支持和合法性赋能,核心在于通过差异化的政策红利释放企业资源活力,同时以合法性信号构建外部信任网络,形成物质基础与制度护盾的双重保障。

从资源支持效应看,柔性税收征管的资源支持效应体现为显性资源补给、隐性管理成本降低与长期资源再配置优化三重路径。第一,柔性税收征管通过政策工具组合直接拓宽高评级企业的资源获取渠道,为企业的突发冲击提供应急资金,从而提升企业韧性。在柔性背景下,纳税信用评级通过差异化激励手段优化评级为 A 级企业的资源获取通道。获评 A 级的企业在税收优惠绿色通道支持下,能够显著缩短退税周期并提升现金流稳定性,从而缓解流动性约束^[9]。此外,近年来纳税信用体系和征信体系结合起来互证互认的“银税互动”也提升了纳税信用的含金量,使其成为企业重要的信用资产,进一步降低了小微企业的银行信贷门槛^[20]。第二,柔性税收征管通过简化合规程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企业动态适应效率,使企业能够更快识别环境变化并调整策略,从而增强企业韧性。A 级企业因稽查频率降低释放的合规管理资源,可被重新配置于风险预警系统建设,从而提升企业对突发事件的响应效率。例如,据兰州市电子税务报道,该市红古区税务干部帮助企业对照行业风险点做“体检”,企业不仅实现零违规,还凭借 A 级纳税信用获得低息贷款;西固区税务局推动“事后核查”向“事前服务”转型,帮助企业将更多精力聚焦在核心业务上,企业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这体现了稽查频率降低后,企业能够将释放的资源重新配置,提升自身风险应对能力。第三,柔性征管导致的税负调整驱动企业优化长期资源投向,形成更具弹性的运营体系,从而提升企业韧性。因为税负降低会减少企业成本,基于成本收益理论,企业会将释放资金投向长期收益项目^[21]。另外,柔性税收征管带来的税收优惠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等长期投资^[22]。此外,税负降低会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助力企业获取长期资金并优化资源配置^[23],从而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可见,柔性税收征管能够通过资源支持效应强化企业生存能力,增强企业韧性。

合法性赋能是柔性税收征管提升企业韧性的另一关键,其作用可通过合规行为激励与信任资本积累双重路径,系统强化企业韧性。一方面,合规行为激励为企业韧性提供基础。纳税信用评级通过将合规表现与政策红利动态绑定,促使企业主动优化治理结构以满足监管要求。例如,浙江绍兴圣大食品有限公司曾因纳税信用 D 级错失退税红利,企业将“提升信用等级”写入董事会年度目标,通过增设税务内控岗位、建立合规审查流程,成功升至 B 级并即时享受留抵退税;浙江普尔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为保住 A 级,专门成立“信用维护小组”,将涉税合规纳入关键绩效指标,再获 300 万元纯信用贷款。并且若评级过程和结果做到公开、透明,征纳双方开展互动、合作、协商,征纳关系将由单向“管理”向共同“治理”转变^[24]。可见,为持续获得纳税信用评级带来的优惠便利,A 级企业可能主动降低避税程度,从而形成守信和激励良性互动的循环发展机制^[25]。A 级企业因信用修复机制的存在,其财务合规性显著优于非 A 级企业,表明柔性征管通过“赏善”而非“惩恶”引导企业建立长效治理体系^[26]。这不仅降低了因税务违规引发的直接风险,更通过完善内部风控流程增强了企业对突发危机的预判与抵御能力,进一步增强韧性。另一方面,信任资本积累可以强化企业韧性的适应性能力。企业高评级产生的信号效应显著强化外部利益相关者信任。在政府层面,A 级企业被纳入政策支持的优先序列,形成隐性信用背书,在危机时期更易获得财政补贴、税收缓缴等定向扶持^[25]。在资本市场层面,高信用评级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性^[27],提升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意愿与股票流动性,为企业应对

资金压力提供缓冲,有效保障业绩增长需求。可见,资源支持与合法性赋能的协同作用,使企业能够兼顾短期生存与长期适应能力。前者提供应对冲击的物质基础,后者因强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合作意愿,形成抵御风险的制度保障,二者协同系统性提升企业韧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柔性税收征管能够提升企业韧性。

(二)柔性税收征管提升企业韧性的供应链声誉和内部治理机制

柔性税收征管可通过制度性信号重塑企业供应链声誉,提高企业韧性。具体而言,A级纳税信用评级作为政府背书的权威合规标识,能够通过信号传递机制降低供应链伙伴的信息不对称,向上下游企业传递企业财务透明度与履约能力的可信信号,降低合作方的信息验证成本,从而延长供应商账期并减少客户订单违约^[28],显著提升供应链稳定性。纳税信用评级通过外部认证机制缓解合作方的风险规避倾向,促使供应链伙伴更倾向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而非短期投机行为。这种稳定性在突发冲击,如原材料价格波动、区域性物流中断时尤为重要,稳定的供应链能保障生产资料持续供应,避免因断供导致的停产风险,为企业抵御冲击提供保障,强化其抗逆性。与此同时,柔性税收征管可能通过声誉外溢效应驱动供应链网络结构的优化重构。纳税信用等级的提升因声誉优势能够吸引多元化供应商与客户主动接入,促使企业主动降低对单一节点的依赖程度。这种网络结构的优化使企业能够分散外部冲击的传导风险,当区域性供应链中断时,纳税信用等级高的企业依托多元化网络快速切换供应渠道的效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并且分散化结构还能推动企业与不同类型伙伴合作,拓展资源获取维度,为适应市场变化提供更多机会,从而增强适应性与恢复性。可见,在供应链稳定性与供应链分散化的协同作用下,柔性税收征管能够将制度性信用资本转化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供应链稳定性保障了运营连续性,而多元化能够增强风险分散潜力,二者共同作用推动企业韧性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柔性税收征管通过提升供应链声誉,进而提高企业韧性。

柔性税收征管可通过抑制代理成本优化企业内部治理,提高企业韧性。其理论逻辑可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与制度约束激励机制展开分析。企业韧性的核心在于应对冲击的生存能力的抗逆性、适应变化的调整能力的适应性和经历危机后的发展能力的恢复性^[16]。尽管纳税信用评级直接反映的是企业纳税合规性,但其与高管自利行为关联并非简单的评级压力—抑制自利的关系,而是通过外部监督、利益相关性强化和资源配置优化的机制,约束企业代理成本,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最终推动韧性提升。第一,纳税信用评级的动态公示机制通过强化外部监督对高管自利行为形成约束。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与股东利益偏离会引发高管超额薪酬与超额在职消费问题^[29]。而高管自利行为的隐蔽性在于信息不对称。纳税信用评级作为政府主导的公共信用评价体系,其评级过程需要企业披露税务信息,客观上提升了企业的财务透明度。透明度的提升使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更易察觉高管自利行为,从而加强外部监督压力。高管若因自利行为引发利益相关者质疑,即使未直接导致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下调,也可能面临声誉损失或股东追责。另外,评级结果的动态公示也会形成外部监督压力,对企业形成治理效应^[24],从而迫使管理层权衡短期自利与长期职业声誉,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纳税信用评级的政策红利与企业整体利益的深度绑定,使得高管自利行为与个人长期收益呈负向关联。高信用评级企业可享受税收优惠、融资便利等政策红利^{[9][30]},这些红利可能转化为企业利润增长与价值提升的源泉。而高管自利的双超行为导致的企业资源错配^[31],不仅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价值创造^[32],更可能降低评级带来的政策红利。这种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绑定关系,促使高管从短期自利转向长期共赢,即抑制自利行为以保障企业获得持续政策红利,进而提升职业发展空间。一方面,抑制高管自利行为能释放被挤占的研发与风险储备资金,充足的研发投入会提升技术壁垒,增强对市场技术迭代的适应性。而风险储备资金能在面临突发冲击时保障企业的抗逆性。另一方面,高纳税评级的政策红利带来的现金流储备不仅能够为外部冲击提供缓冲,还能够有效促进创新^[33],推动企业在危机后实现技术升级或转型,从而提升企业韧性。可见,柔性税收征管能够形成企

业治理升级的内生动力,约束高管自利行为,强化企业适应性与恢复性,最终实现韧性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柔性税收征管通过优化内部治理,进而提升企业韧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检验柔性税收征管的韧性提升效应,本文利用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准自然实验,建立如下多期DID模型进行检验:

$$Resili_{i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i \times Post_t + \beta X_{it} + \delta_i + v_t + \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t和i分别表示年份和企业。Resili为企业韧性。Treat表示企业是否为处理组,Post表示政策的实施时间,交乘项Treat×Post的系数方向反映柔性税收征管的作用效果。X表示可能影响企业韧性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为增强结论可靠性,本文同时纳入年份固定效应 v_t 和个体固定效应 δ_i , ϵ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假说,预期 α_1 显著为正,表明柔性税收征管有助于企业韧性提升。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韧性(Resili)。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3][34]},本文通过企业风险抵抗能力(财务波动)和恢复能力(长期增长)来衡量企业韧性。具体地,财务波动以股票回报率来衡量,使用公司的月股票收益率的年度标准差予以计算。长期增长则通过3年的销售收入累计增长率衡量,最终的企业韧性Resili通过熵值法综合计算得出。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Treat×Post。其中,Treat表示纳税信用评级结果,若观测期内企业被披露为A级纳税人,则Treat=1;对于从未获得A级评定的企业,Treat=0。Post为政策时点虚拟变量,企业被披露为A级纳税人的当年及以后年度Post=1,否则Post=0。

3.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纳入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账市比(BM)、现金流状况(CFO)、托宾Q(Tbq)、股权制衡度(Blc)、管理层持股比例(Mhd)、董事规模(Brd)、董事独立性(Indep)和两职合一(Dual)。各变量的具体含义详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企业韧性	Resili	基于熵权法计算的企业韧性指标
双重差分项	Treat×Post	处理组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
企业规模	Size	Ln(总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账市比	BM	账面价值/市值
现金流状况	CFO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托宾Q	Tbq	市值/总资产
管理层持股比例	Mhd	管理层持股数量/总股数
股权制衡度	Blc	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规模	Brd	Ln(董事会人数)
董事独立性	Indep	独董人数/董事会人数
两职合一	Dual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Dual=1,否则Dual=0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 2008—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纳税信用评级数据通过天眼查手工收集,再与国家税务总局网站进行核对。相关的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希施玛(CSMAR)数据库。为提升结论可靠性,对金融类、ST 或 *ST 处理以及重要的财务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予以删除。为减弱极端数据的干扰,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表 2 的统计结果表明,研究样本的企业韧性(Resili)均值为 0.0318,标准差为 0.0332,最小值为 0.0000,最大值为 0.4265,说明研究样本的企业韧性存在较大差异,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esili	17266	0.0318	0.0332	0.0000	0.4265
Treat×Post	17266	0.3066	0.4611	0.0000	1.0000
Age	17266	22.4109	1.3296	19.4881	26.7103
Size	17266	0.4613	0.2029	0.0424	0.9289
Lev	17266	0.0374	0.0612	-0.4348	0.2223
Roa	17266	0.6549	0.2553	0.0523	1.2966
BM	17266	0.0506	0.0729	-0.2262	0.2729
CFO	17266	1.9576	1.4689	0.7713	19.1145
Tbq	17266	0.6577	0.5591	0.0168	2.7657
Blc	17266	0.0868	0.1703	0.0000	0.6975
Mhd	17266	2.1440	0.1923	1.6094	2.7081
Brd	17266	0.3720	0.0522	0.2500	0.5714
Indep	17266	0.2313	0.4217	0.0000	1.000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考察柔性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韧性,使用模型(1)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由于样本时间跨度较长,本文对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个体与年份固定效应,并基于企业层面聚类调整以控制异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变量	(1)	(2)
	Resili			Resili	
Treat×Post	0.0038 *** (0.0006)	0.0019 *** (0.0007)	Mhd		-0.0062 ** (0.0029)
Size		0.0062 *** (0.0006)	Brd		0.0029 (0.0026)
Lev		0.0085 *** (0.0025)	Indep		0.0053 (0.0075)
Roa		0.0412 *** (0.0048)	Dual		0.0000 (0.0008)
BM		-0.0079 *** (0.0019)	常数项	0.0307 *** (0.0002)	-0.1162 *** (0.0148)
CFO		0.0087 *** (0.0033)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Tbq		0.0003 (0.0002)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Blc		-0.0008 (0.0007)	样本量	17266	17266
			调整后R ²	0.688	0.700

注: *、**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至公司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方差问题。列(1)中,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times Post$ 的回归系数为 0.0038,且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不控制企业异质性特征的情况下,处理组企业的韧性相对于对照组平均提升了 0.38%。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的提升效应。然而,基准回归可能因遗漏企业规模、财务状况等关键变量而高估政策效应。列(2)引入了相关控制变量,结果显示, $Treat \times Post$ 的回归系数为 0.0019,且在 1%水平上保持显著。这表明,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和现金流稳定性等特征部分解释了政策效应,但柔性税收征管仍对企业韧性存在显著的净提升作用。从经济意义来看,相对于未被评为 A 级的企业,纳税信用 A 级企业的韧性提升 0.19%,在均值处(0.0318)提升 5.97%(0.0019/0.0318)。在进行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后,获得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企业韧性显著提升。可见,柔性税收征管提升了企业韧性,验证了前文的 H1。

(二)稳健性检验

1. 动态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可有效缓解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韧性之间的内生性偏误。该方法的应用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的成立,即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企业韧性需保持相似趋势。为验证该假设,本文将企业首次获评 A 级纳税人的年份作为基期,进行动态效应检验。如图 1 所示,在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被披露为 A 级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的韧性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政策实施前的平行趋势假设。这一结果说明,企业韧性的提升是由柔性税收征管政策所带来的,而非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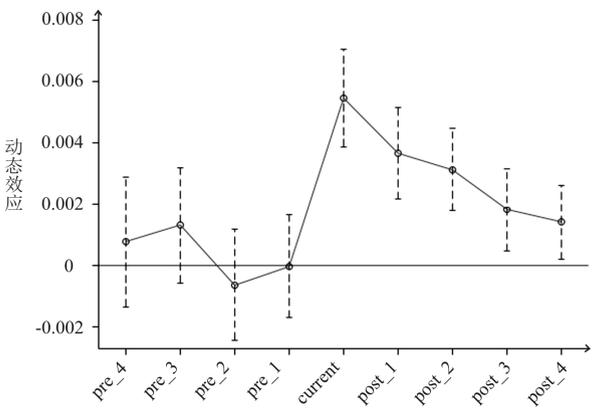


图 1 动态效应检验

2. 安慰剂检验

进一步,本文使用安慰剂检验缓解来自随机因素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偏误。随机选取实验组样本和政策实施时间,使用重新构造的政策虚拟变量 $Treat \times Post$ 进行回归,绘制出重复 500 次回归的系数分布图形。鉴于随机抽取实验组样本和政策实施时间,虚假实验组不应对企业韧性产生显著影响,从而说明本文基准回归中企业韧性的提升确实归因于柔性税收征管的政策效应。如图 2 所示,虚假回归系数近似服从正态分布,集中分布于 0 附近,且大多数估计系数的 P 值大于 0.1。这个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结论不是由未观察到的偶然因素所致,柔性税收征管制度确实能够提升企业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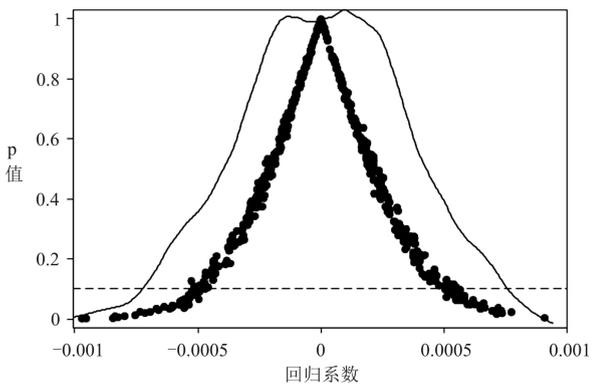


图 2 安慰剂检验

3. 更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基于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两个维度采

用熵权法计算企业韧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 Fama-French 五因子模型计算公司特质波动率,利用熵权法重新计算企业韧性(Resili_FFF)。

$$y_{it} = \alpha_i + \beta_i r_{mt} + s_i SMB_t + h_i HML_t + r_i RMW_t + c_i CMA_t + \epsilon_{it} \quad (2)$$

式(2)中, y_{it} 为股票相对于无风险利率的超额收益率(考虑现金股利再投资的日股票回报率一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为一年期存款的年化利率。 r_{mt} 为市场风险溢价(市场组合收益率一无风险利率)。 SMB_t 为公司的规模因子, HML_t 为公司的价值因子, RMW_t 表示盈利因子, CMA_t 为投资因子。 β_i 、 s_i 、 h_i 、 r_i 、 c_i 为五个因子的回归系数。使用回归残差 ϵ_{it} 的标准差衡量特质波动率。表4第(1)和(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更换企业韧性衡量指标为 Resili_FFF 之后,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另外,为了进一步增强结论说服力,本文使用 t+1 期因变量进行回归,在第(3)和(4)列,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更换被解释变量后,本文结果依然稳健可靠。

表 4 更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4)
	Resili_FFF	Resili_FFF	Resili_{t+1}	FResili_{t+1}
Treat×Post	0.0029 *** (0.0007)	0.0012 * (0.0007)	0.0035 *** (0.0006)	0.0023 *** (0.0006)
常数项	0.0253 *** (0.0002)	-0.1228 *** (0.0149)	0.0305 *** (0.0002)	-0.0276 (0.0174)
个体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7179	17179	14563	14563
调整后R ²	0.6230	0.6380	0.7430	0.7500

4. 倾向得分匹配法

由于企业自身财务状况和治理结构差异可能会对其行为决策造成影响,从而导致纳税信用评级结果并非随机分布,造成样本自选择偏误。为减轻这一干扰,本文引入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重新进行回归。考虑到对照组和处理组样本企业共性特征对比的需要,参考相关研究^[13],加入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账市比(BM)、现金流状况(CFO)、托宾 Q(Tbq)和股权制衡度(Blc)作为协变量,尽可能匹配出与处理组财务状况和治理结构相似的企业。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相对于匹配前,匹配后协变量的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均小于 10%,且 T 检验对应的 p 值均大于 0.05。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匹配后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了平衡性检验。PSM 法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 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数值变化不明显,说明企业韧性提升的确是由柔性税收征管的政策效应导致的,并非源于对照组和处理组之间的内在差异。

表 5 PSM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U/M	均值		标准偏差 (%)	T 检验		变量	(1)	(2)
		处理组	对照组		t 值	P> t		Resili	Resili
Lev	U	0.4156	0.5073	-46.40	-30.47	0.0000 ***	Treat×Post	0.0038 *** (0.0006)	0.0019 *** (0.0007)
	M	0.4164	0.4148	0.40	0.28	0.7760			
Roa	U	0.0507	0.0241	44.40	29.18	0.000 ***	控制变量	否	是
	M	0.0507	0.0497	1.50	1.09	0.2740			
BM	U	0.6457	0.6642	-7.20	-4.75	0.0000 ***	常数项	0.0307 *** (0.0002)	-0.1166 *** (0.0149)
	M	0.6457	0.6429	1.10	0.78	0.4360			
CFO	U	0.0602	0.0411	26.50	17.40	0.0000 ***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M	0.0602	0.0602	0.00	0.03	0.9760			
Tbq	U	1.8731	2.0426	-11.60	-7.59	0.0000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M	1.8731	1.8905	-1.20	-1.07	0.2840			
Blc	U	0.7145	0.6008	20.40	13.44	0.0000 ***	样本量	17250	17250
	M	0.7145	0.7317	-3.10	-1.89	0.0580 *			
调整后R ²								0.6880	0.7000

五、进一步分析

(一) 机制分析

为规避传统三步法可能产生的干扰,本文基于江艇(2022)提出的改进型的两步法进行机制分析^[35],构建如下模型(3)进行检验:

$$M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Treat}_i \times \text{Post}_t + \beta X_{it} + \delta_i + v_t + \epsilon_{it} \quad (3)$$

式(3)中, M 为机制变量,纳税信用评级 $\text{Treat} \times \text{Post}$ 对 M 的回归系数 α_1 用以检验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提升的机制效应。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从强化供应链声誉、提升内部治理水平双重视角进行机制检验。

1. 强化供应链声誉

为验证供应链声誉优化机制,检验纳税信用评级对于企业供应链稳定性(Sc_stability)和供应链集中度(Sc_concen)的影响。参考蒋殿春和鲁大宇(2022)^[36]以及董浩和闫晴(2025a, 2025b)^{[37][38]}的研究,在供应商端,使用稳定供应商(上一年的前五大供应商中仍为本年前五大供应商)数量除以5衡量供应商稳定性。在客户端,使用稳定客户(上一年的前五大客户中仍为本年前五大客户)数量除以5衡量客户稳定性。若 $\text{Treat} \times \text{Post}$ 对 Sc_stability 的回归系数 α_1 为正,则说明企业供应链声誉得以提升,拥有较为稳定的供应链网络。表6第(1)列针对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进行识别,结果显示 $\text{Treat} \times \text{Post}$ 对 Sc_stability 的影响系数为0.1199,且在1%水平上显著,其经济含义为政策实施后,与对照组企业相比,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供应链稳定性提升11.99%。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佐证供应链声誉机制,引入供应链集中度(Sc_concen)进行分析。同样地,在供应商端,使用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总采购额比率衡量供应商集中度。在客户端,使用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率衡量客户集中度。同样地,若 $\text{Treat} \times \text{Post}$ 对 Sc_concen 的回归系数 α_1 为负,则说明企业供应链声誉得以提升,对单一供应链合作伙伴的依赖下降。表6第(2)列结果显示, $\text{Treat} \times \text{Post}$ 对 Sc_concen 的影响系数为-0.0104,且在5%水平上显著,其经济含义为政策实施后,与对照组企业相比,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供应链集中度下降1.04%。研究表明,供应链稳定性作为企业发展的压舱石^[39],能够有效抵御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冲击,显著提升业绩稳定性^{[40][41][42]}。而供应链集中度的降低意味着供应链多元化布局,通过分散风险节点形成的“多锚点”降低供应链中断风险,从而促进企业绩效增长^[43]。因此,上述结果反映出柔性税收征管的实施对纳税信用等级优异的企业产生了显著的供应链声誉优化效应,有助于为企业韧性提升提供来自外部供应链层面的保障。本文的H2得以验证。

2. 提升内部治理水平

为验证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机制,根据前文的分析,检验纳税信用评级对于企业高管超额薪酬(Over_pay)和超额在职消费(Over_perk)水平的影响。参考蔡贵龙等(2018)以及徐经长和李兆芑(2022)的研究,使用前三名高管实际薪酬与预期薪酬的差额衡量超额薪酬(Over_pay)。若 $\text{Treat} \times \text{Post}$ 对 Over_pay 的回归系数 α_1 为负,则说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得以提升,高管超额薪酬水平降低。表6第(3)列针对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超额薪酬的影响进行识别,结果显示 $\text{Treat} \times \text{Post}$ 对 Over_pay 的影响系数为-0.0782,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与对照组企业相比,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高管超额薪酬水平降低。由于超额在职消费通常也是高管谋求隐性利益的自利行为^[45]。同样,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为了佐证内部治理机制,引入超额在职消费(Over_perk)进行分析。第(4)列回归结果显示 $\text{Treat} \times \text{Post}$ 对 Over_perk 的影响系数为-0.0778,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与对照组企业相比,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降低。鉴于高管自利行为会削弱企业抵御系统性冲击的能力^[46],进而降低企业韧性。上述结果反映出柔性税收征管的实施对纳税信用等级优异的企业产生了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有助于为企业韧性提升提供来自内部治理层面的保障。本文的H3得以验证。

	(1)	(2)	(3)	(4)
	Sc_stability	Sc_concen	Over_pay	Over_perk
Treat×Post	0.1199 *** (0.0296)	-0.0104 ** (0.0042)	-0.0782 *** (0.0179)	-0.0778 ** (0.03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1428 *** (0.5493)	0.8913 *** (0.1328)	-0.1757 (0.4212)	3.3327 *** (0.7355)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78	13242	17211	14728
调整后R ²	0.3410	0.7760	0.8330	0.6540

(二)异质性分析

1.产权和规模

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异质性。国有产权具有的隐性信用担保使其更容易获得政府财税补贴和优惠^[47],小规模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柔性税收征管通过减少现金流挤占,能有效缓解企业流动性压力^[9]。此外,民营企业拥有更强的动机进行税收筹划^[48],从而利用政策弹性进行适应性调整,将节约的税款投入供应链多元化,进而提升抗风险能力。因此,相较于国有和大规模企业,进行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后,小规模、民营企业中获得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企业韧性提升效果应该更为明显。鉴于此,将企业按照产权性质划分为民营(NSOE)和国有(SOE)样本组,分组回归结果为表 7 所示。对于第(1)列的国有企业,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而在第(2)列民营企业样本组中,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二者之间的组间系数差异显著。说明纳税信用 A 级更有助于增强民营企业韧性。此外,按照企业规模的中位数划分大规模企业(LE)和小规模企业(SME)样本组,对于第(3)列的大规模企业,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在第(4)列的小规模企业样本组,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组间系数差异显著,说明纳税信用 A 级更有助于增强小规模企业韧性。

表 7 产权和生命周期异质性检验

	(1)	(2)	(3)	(4)	(5)	(6)	(7)
	SOE	NSOE	LE	SME	Growth	Mature	Decline
Treat×Post	-0.0011 (0.0013)	0.0033 *** (0.0008)	0.0012 (0.0012)	0.0027 *** (0.0007)	0.0039 ** (0.0018)	0.0001 (0.0008)	0.0002 (0.00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0640 *** (0.0247)	-0.1468 *** (0.0196)	-0.1306 *** (0.0295)	-0.1287 *** (0.0210)	-0.2286 *** (0.0421)	-0.0654 *** (0.0184)	-0.0831 *** (0.0229)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7699	9533	9066	8014	2804	7884	4866
调整后R ²	0.727	0.676	0.707	0.735	0.707	0.748	0.802
系数差异	0.0044 ***		0.0015 ***			0.0037 *	

2.生命周期

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存在生命周期异质性。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的成长期企业通常需要大量购入生产资料和研发创新,柔性税收政策释放的现金流可被用于市场开拓和技术升级,增强其动态能力的积累。随着企业进入成熟阶段,产品市场地位稳固,外部融资条件更加优越。进入衰退期后,由于管理冗余和代理成本上升,可能倾向于将资金投入低效领域。为检验企业生命周期差异对政

策效果的影响,参考李云鹤等(2011)^[49]和梁上坤等(2019)^[50]的方法衡量企业生命周期,并将其界定为成长期(Growth)、成熟期(Mature)和衰退期(Decline)三阶段。运用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7的(5)~(7)列所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Treat×Po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Treat×Post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且Growth和Decline样本组之间的组间差异系数显著。这表明,纳税信用A级更有助于增强成长期企业韧性。

3. 分析师关注

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存在分析师关注异质性。分析师关注较低的企业通常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51],因此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市场声誉主要依赖官方认证而非第三方评价。那么,纳税信用评级A级可能通过绑定企业纳税行为与公共信誉,形成政府背书的“硬声誉”资产。这种声誉资本能够替代分析师报告的“软声誉”功能,帮助企业在供应链合作、客户信任等场景中建立竞争优势,补偿声誉缺口,从而使得政策对于企业韧性的提升效应更强。鉴于此,本文借鉴吴德军和张雯洁(2023)的测度方法,构建分析师关注度指标AnaAtt,采用跟踪企业的分析师人数加1取自然对数衡量^[52]。根据AnaAtt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划分样本为分析师关注度较低(LAnaAtt)和分析师关注度较高(HAnaAtt)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在第(2)列分析师关注度较低时,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尽管在第(1)列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这一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但LANaAtt样本组的系数显著大于HAnaAtt样本组,组间系数差异显著。这表明,纳税信用A级能够弥补分析师关注的声誉缺口,更有助于增强分析师关注较低的企业韧性。

4. “金税三期”

“金税三期”工程作为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改革的核心举措,通过整合税务数据、强化信息监控、优化征管流程,显著提升了税收征管的效率与透明度。这种“刚性”信息化强征管模式会使企业隐性违规行为显性化^[14],进而增加其违约成本。纳税信用评级A级可能与“金税三期”工程互补,发挥“刚柔并济”的效果,使得政策对于“金税三期”工程试点的企业韧性提升效应更强。鉴于此,参考张翼飞等(2024)的研究^[14],将企业按照经营所在地是否入选“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分为试点组(Goldtax)和非试点组(NGoldtax)。分组回归结果见表8的第(3)(4)列,对于“金税三期”试点组企业,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于非试点企业,这一系数不显著,二者之间系数差异显著。这表明,“金税三期”工程能够与纳税信用A级互补,进一步增强柔性税收征管对于企业韧性提升的作用效果。

表8 分析师关注和“金税三期”异质性检验

	(1)	(2)	(3)	(4)
	HAnaAtt	LANaAtt	NGoldtax	Goldtax
Treat×Post	0.0017* (0.0009)	0.0027*** (0.0010)	-0.0002 (0.0011)	0.0048*** (0.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1032*** (0.0177)	-0.1291*** (0.0298)	-0.1103*** (0.0354)	-0.3155*** (0.0222)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2123	4754	7275	9901
调整后R ²	0.694	0.739	0.704	0.784
系数差异		0.0010*		0.0050***

(三) 不确定性助推政策效果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波动加剧,对稳定政策信号的依赖度增强。纳税信用评级A级通过提供合规性认证和政策确定性锚点,帮助企业对冲外部不确定性风险^[53]。此时,纳税信用评级的“政府背书”功能成为企业获取金融机构信任、维持供应链稳定的关键凭证,放大其韧

性提升效应。此外,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市场风险溢价上升,金融机构信贷配给趋严。柔性税收征管通过纳税信用信号降低企业与资金供给方之间的信息摩擦,使企业更易获得低成本融资^[54]。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尝试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能够助推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提升的政策效果。

参考李增福等(2022)的测算框架^[55],使用 Baker 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衡量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程度^[56],EPU 数值越大,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越高。将 EPU 和政策变量 Treat × Post 的交乘项引入回归模型(1)。在表 9 的列(1)和(2)中,交乘项的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韧性提升的政策效应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而增强。可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强化了政策的信号价值,柔性税收征管政策成为不确定性的“稳定剂”,外部环境越动荡,纳税信用 A 级认证对企业韧性的边际增益越高。

	(1)	(2)
	Resili	
Treat × Post	-0.0022 (0.0018)	-0.0028 (0.0017)
EPU × Treat × Post	0.0041 *** (0.0012)	0.0033 *** (0.0011)
控制变量	否	是
常数项	0.0307 *** (0.0002)	-0.1160 *** (0.0148)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17266	17266
调整后R ²	0.6880	0.7000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 2008—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研究样本,利用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 DID 模型考察柔性税收征管政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韧性,表明柔性税收征管有助于企业韧性培育。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获得信用评级 A 级企业的韧性显著增强。(2)双重作用机制体现为,一是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实施会增强企业的供应链声誉,从而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并降低供应链集中度。二是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有效降低高管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水平。(3)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呈现非对称性,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生命周期方面,对于民营、小规模和成长期企业韧性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在信息环境维度,声誉补偿效应使得政策对分析师关注较低企业的韧性提升更显著。“金税三期”工程与柔性税收征管形成“刚柔并济”的政策协同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强化柔性税收征管的韧性提升效果。

(二)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纳税信用与供应链声誉深度协同的政策框架,优化企业外部风险缓冲机制。针对纳税信用评级通过供应链声誉传导提升企业韧性的核心路径,建议建立跨部门联动的信用赋能体系。通过将纳税信用等级嵌入供应链金融评价标准,引导核心企业优先选择高信用等级供应商,形成以信用为纽带的稳定供应网络。可设计供应链信用风险对冲工具,允许高信用企业将其纳税评级转化为供应链保险额度,当遭遇上游突发风险时获得应急融资支持。同时,针对民营企业 and 中小企业集中的产业链,实施链主信用辐射计划,由高信用核心企业为配套中小企业提供信用背书,帮助其降低融资成本并拓展市场网络,从而系统性提升产业链的协同抗风险能力。

第二,完善纳税信用与企业治理的动态关联制度,强化内生韧性培育基础。围绕信用评级约束超额在职消费、优化内部治理的作用机理,建议重构治理合规与税收激励的协同规则。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纳税信用变动与高管薪酬结构的关联性,对因治理缺陷导致信用等级下调的企业实施税收惩罚性调节,倒逼治理结构优化。同时,建立治理质量驱动的弹性税收政策,对长期保持高信用等级且治理规范的企业,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上浮、增值税留抵退税加速等叠加优惠。此外,依托税

收大数据构建“治理—信用”实时反馈系统,动态监测董事会决策效率、关联交易合规性等指标,对治理异常企业实施信用评级冻结与定向整改辅导,形成“治理优化—信用增值—韧性提升”的良性循环。

第三,深化“金税三期”工程与韧性培育的政策协同,构建数据驱动的动态支持体系。基于研究发现“金税三期”与柔性税收征管的协同效应,建议强化其对企业韧性的靶向支持功能。对纳税信用 A 级企业,依托“金税三期”的供应链数据追踪能力,实时监控其上下游企业的经营风险,当识别到关键供应商出现纳税异常或信用降级时,自动触发定向政策响应,包括优先匹配替代供应商资源库、提供供应链重组专项税费缓缴额度等。

参考文献:

- [1] Linnenluecke, M. K. Resilience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A Review of Influential Publications and a Research Agend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7, 19(1): 4—30.
- [2] 宋瑛,付俊治.数字化创新能有效提升涉农企业韧性吗——来自涉农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J/OL].*农业技术经济*,2024-11-05,DOI:10.13246/j.cnki.jae.20241104.001.
- [3] Zhang, B., Zhang, J., Chen, C.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Resilience[J]. *Global Finance Journal*, 2024, 63: 101042.
- [4] Tang, C., Dong, S., Zhou, R. 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on Corporate Resilienc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5, 97: 103834.
- [5] 胡海峰,田一迪,王爱萍,等.内部资本市场能提高企业韧性吗[J].*当代财经*,2025(1):56—69.
- [6] 连燕玲,孙汉,高皓.危中寻机:战略联盟对民营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5(7):161—172.
- [7] 万相昱,唐亮,石雪梅,等.中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的经济效应评估——基于微观模拟模型的测算[J].*学术研究*,2020(10):93—100.
- [8] 冀云阳,潘钰.税收征管独立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国地税合并政策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5(1):54—66.
- [9] 孙雪娇,翟淑萍,于苏.柔性税收征管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自然实验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9(3):81—99.
- [10] 鲍文爽,李齐云.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J].*财经科学*,2022(10):137—148.
- [11] 靳毓,雯雯,冯晓晴.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的经验证据[J].*江苏社会科学*,2022(4):163—174.
- [12] 闫慧慧.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投实”抑或“向虚”[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3):55—70.
- [13] 刘元生,张苏皖,李建军.增值税税率优化的财政经济效应——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5(1):56—70.
- [14] 张翼飞,张双龙,刘奥.税收征管柔性化与企业 ESG 表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2):57—73.
- [15] 程名望,谷阳,韩雨萱.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27—35.
- [16] Hillmann, J., Guenther, 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 Valuable Construct for Management Researc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21, 23(1): 7—44.
- [17] 李平,竺家哲.组织韧性:最新文献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3):25—41.
- [18] Xu, N., Chen, J., Zhou, F., et al. Corporate ESG and Resilience of Stock Pric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hina[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3, 79: 102040.
- [19] Shanaev, S., Ghimire, B. When ESG Meets AAA: The Effect of ESG Rating Changes on Stock Returns[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2, 46: 102302.
- [20] 杨龙见,吴斌珍,李世刚,等.“以税增信”是否有助于小微企业贷款?——来自“银税互动”政策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1(7):96—112.
- [21] 汪圣国,杜素珍.社会信任与企业主观税负感[J].*财政科学*,2023(7):18—33.
- [22] 杜剑,史敏敏,杨杨.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研发投入的遮掩效应[J].*管理学报*,2021(3):105—125.

- [23] Modigliani, F., Miller, M. H. Corporate Income Taxes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a Corre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3): 433—443.
- [24] 冀云阳,高跃.税收治理现代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准自然实验的研究[J].财经研究,2020(12):49—63.
- [25] 周泽将,刘瑾,雷玲.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效应研究——基于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视角[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5(1):21—37.
- [26] 陶东杰,李成,蔡红英.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与企业税收遵从——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J].税务研究,2019(9): 101—108.
- [27] 何慧华,方军雄.柔性税收征管能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吗?——基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证据[J].财贸研究, 2024(12):77—91.
- [28] 李柯润,陈家和,吴一平,等.纳税信用的供应链传递效应研究[J].财贸经济,2024(3):41—58.
- [29] 蔡贵龙,柳建华,马新啸.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J].管理世界,2018(5):137—149.
- [30] 郭玲.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1):86—97.
- [31] 叶建宏,汪炜.政策性负担、薪酬委员会独立性与经理人超额薪酬——来自后股改时期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 [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4):31—41.
- [32] 孙世敏,柳绿,陈怡秀.在职消费经济效应形成机理及公司治理对其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6(1): 37—51.
- [33] 刘行,赵健宇.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准自然实验”[J].会计研究,2019(9): 43—49.
- [34] 罗良文,张琳琳,王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来自中国 A 股上市企业的证据[J].改革,2024(5): 64—79.
- [35]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36] 蒋殿春,鲁天宇.供应链关系变动、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经济管理,2022(10):56—74.
- [37] 董浩,闫晴.供应链稳定性能否实现稳就业? [J].财经研究,2025(2):123—137.
- [38] 董浩,闫晴.供应链稳定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J].证券市场导报,2025(2):68—79.
- [39] 张志元,马永凡.危机还是契机:企业客户关系与数字化转型[J].经济管理,2022(11):67—88.
- [40] Jüttner U, Maklan S.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 Empirical Study[J].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1, 16(4): 246—259.
- [41] 陶锋,王欣然,徐扬,等.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J].中国工业经济,2023(5): 118—136.
- [42] 陈高,张燕,刘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4(1):43—56.
- [43] Brandon-Jones E, Squire B, Van Rossenberg Y G T. The Impact of Supply Base Complexity on Disruptions and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lack and Visibi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15, 53(22): 6903—6918.
- [44] 徐经长,李兆芄.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超额薪酬的中介效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 (9):97—112.
- [45] 张楠,卢洪友.薪酬管制会减少国有企业高管收入吗——来自政府“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动态, 2017(3):24—39.
- [46] Sajko, M., Boone, C., Buyl, T. CEO Gre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o Systemic Shock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1, 47(4): 957—992.
- [47] 王叙果,沈红波,钟霖佳.政府隐性担保、债券违约与国企信用债利差[J].财贸经济,2019(12):65—78.
- [48] 刘慧龙,吴联生.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J].管理世界,2014(4):42—52.
- [49] 李云鹤,李湛,唐松莲.企业生命周期、公司治理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J].南开管理评论,2011(3):110—121.
- [50] 梁上坤,张宇,王彦超.内部薪酬差距与公司价值——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新探索[J].金融研究,2019(4): 188—206.
- [51] 喻彪,杨刚.会计信息可比性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J].投资研究,2022(6):31—58.
- [52] 吴德军,张雯洁.绿色前置与分析师关注——来自社会责任报告的证据[J].会计研究,2023(5):179—192.
- [53] 刘强,陈师弟,韩洪灵.纳税声誉与企业风险——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证据[J].财政研究,2023 (10):74—86.

[54] 王佳,李文.柔性税收征管、声誉机制与企业税负:理论与实证[J].现代经济探讨,2022(10):64—75.

[55] 李增福,陈俊杰,连玉君,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债长用[J].管理世界,2022(1):77—89.

[56] 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4): 1593—1636.

The Impact of Flexible Tax Administration on Corporate Resilience: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Disclosure of Tax-Paying Credit Rating

XU Rong^{1,2} LI Xuefeng³

(1.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3. *School of Finan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global economic uncertainty,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08 to 2023, this paper uses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ax credit rating to construct a multi-period DID model to reveal the policy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flexible tax administration on corporate resilie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flexible tax administr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corporate resilienc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x credit rating system, the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with A tax credit rating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dual mechanism is reflected in the first is to enhance the enterprise's supply chain reput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supply chain and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supply chain. Secondly, at the level of internal governance, effectively reduce the excessive salary and excessive on-duty consumption of senior executiv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the policy is asymmetric, and in terms of ownership nature, enterprise size and life cycle,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private, small and growing enterprises is more obvious. In the dimension of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reputation compensation effect makes the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with low analyst attention more significant. The "Third phase of golden tax" project and flexible tax administration form a policy synergy effect of "combining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In addition,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will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improvement effect of flexible tax administr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expand the theoretical boundary of corporate resilience research, reveal the unique value of flexible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but als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the tax governance system and realizing the efficiency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form of "delegating power, delegating regulation and providing services."

Key words: Flexible Tax Administration; Corporate Resilience; Supply Chain Reputation; Excessiv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Excessive Perk Consumption

(责任编辑:肖加元)